

中共金华地委办公室



# 通向富裕的道路

浙江人民出版社

5.22

F325.22

38

3

6415/05

# 通向富裕的道路

中共金华地委办公室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B 033148

通向富裕的道路

中共金华地委办公室编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625 字数110,000 印数00.001—45,000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4103·53

定 价：0.47 元

---

# 农业大变革的真实记录

## ——代序言

厉德馨

这本书是金华地委办公室主编的。全书选用的三十二篇材料，真实地、生动地记录了金华地区农业战线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在读者面前展现了通过家庭承包制同专业化、社会化相结合的道路，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由自给性农业向商品化农业转变的光辉前景，很能发人深省。

建国以来，在通过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基础上，我们党领导广大农民，通过若干个具体的步骤，对农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历史性变革。在改革生产关系的同时，通过国家和农民的共同努力，不断壮大农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在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方面，在支援国家建设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是人所公认、有口皆碑的。

但是，社会主义农业并没有也不应当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固定的模式。我们在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对如何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农业发展的道路注意不够，自觉不自觉地搬用了外国的一些做法。从合作化运动一开始，我们就把几十人、几百人集中在一起干活，即所谓“大呼隆”看成是社会主义农业基本的劳动方式；把评工记分、按工分分配，即吃“大锅饭”看成是社会主义农业基本的分配

方式。这种劳动和分配方式，使劳动者的权、责、利相互脱离，严重地压抑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人们虽然也感到这种模式有很多弊端，也曾经在某些方面作过一些改良，但因为始终认为这种劳动方式和分配方式是社会主义农业的基本特征，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进行彻底的改革。在当时，人们普遍存在这么一种看法，即认为发展工业容易，发展农业难，农业拖了工业发展的后腿，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金华地区虽然自然条件很好，农业资源也比较丰富，但在三中全会以前，还有不少社队人均口粮在四百斤以下，人均分配收入在五十元以下；人们对于何时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农村何时能够富起来，也信心不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束缚，党中央首先抓住农业这个环节，清理“左”的思想，拨乱反正。经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逐步地找到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新路子。现在人们已经看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农业一马当先，方兴未艾。过去长期贫困的地方，迅速改变面貌；过去比较富裕的地方，现在更上一层楼。农业上去难、解决温饱问题难、农业拖后腿等等议论也开始改变了。这是一个多么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

金华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农业改革的起步时间比较迟。但从一九八一年秋季下了决心以后，改革的步伐相当快。全区用一个冬、春的时间，就基本落实了家庭承包制。在此基础上，又因地制宜地推行了多种形式的自愿联合，建立了灌溉、植保、机耕、育秧、饲料等服务公司或服务站，为承包

户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解决了一家一户干不了或者干了不合算的事。农民对此兴高采烈，反映说：“公司办到家门口，寡妇种田不用愁。”家庭承包制和各种专业化、社会化事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劳动效率，使农民有可能按照各自的具体条件，发展各种专业、兼业的生产项目，农村中涌现出许多重点户、专业户。顺应这种发展的趋势，地区领导机关又强调进一步放宽政策，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鼓励和促进它的发展。重点户、专业户的发展，在农民中自觉地产生了联合的要求，各种形式的联合体也应运而生。一个包一个统，一个专一个联，不但极大地调动了社员个人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劳动潜力、资金潜力、技术潜力都充分地发挥出来，而且也充分地发挥了集体经济统一经营、相互协作的优越性，把家庭承包制同专业化、社会化密切结合起来。

现在这条新路子虽然还不完善，还是一个新生的婴儿，但已经在各个方面显示了它的极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从本书选用的材料中，读者可以明显地看到，实行这样一种体制，不但可以使农民较快地摆脱贫困，而且可以使农民较快地走向富裕。难怪人们在总结经验中，说这条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新路子“打开了农村致富的闸门”。一个地方、一个社队是这样，整个地区都是这样。一九八二年，金华地区农业全面发展，不论是增产的绝对数还是发展的速度，都创造了历史的新纪录。粮食生产，过去要十年左右才能增产十亿斤，而一九八二年一年就增产十亿斤以上。过去历来是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超过农业总产值的增产幅度，而在一九八二年，农业总产值增长的幅度则远远超过工业总产值的增长

幅度。过去农民人均收入一年增加最多不过三十元左右，而在一九八二年，则增加了八十元以上。如果人间真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么把这样的发展说成是人民创造了奇迹，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这条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新路子，不但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也能创造出巨大的精神财富。物质变精神。由于党的政策给农民带来了看得见、拿得到的巨大物质利益，人民就从心底里感激党中央，用各种形式颂扬党中央和党的领导人，党和农民群众的关系进一步改善了。随着这条新路子的不断落实和完善，过去那种增产不增收、分配不兑现的情况改变了，干部不参加劳动、瞎指挥的情况也改变了，因而干群关系也改善了。社队的自主权，社员的主人翁地位，都得到了确认，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证。在社员群众之间，由于经济利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已经由相互矛盾、不断争吵变为贫富互济、强弱相帮。由于大锅饭打破了；不劳动者不得食，懒汉混不下去了，所以不少人由懒变勤。由于学不学技术同个人的利益直接有关了，所以农民学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大为提高，正在有力地推动着农村的科学进步，文化发展。走上这条新路子以后，干部开始从周而复始、没完没了的催收催种催管中解放出来，这就为加强农村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加强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和物质基础，提供了必需的时间。金华地区一九八二年所以能够在党的建设方面，在开展基本国策的全民教育方面，迈开新的步伐，取得新的成就，除了其它的原因以外，没有一项不是同农业上的这种改革卓有成效紧密相联的。

这条新路子，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讨论这个问题，还得从农业本身的特点和规律性方面去探求。大家知道，农业生产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它的对象是有生命的，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是如此。在目前的生产水平和科技水平上，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受自然因素的决定性影响。农业的这一特点，要求劳动者在生产过程的每一件具体事情上，都有充分的自主权和高度的负责精神，以便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情况，决定采取相应的对策和具体有效的措施。如果生产者不能灵活自主地解决生产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而象过去那样在很大范围内（通常是一个生产队）集中劳动，领导者把什么都包揽下来，实行统一指挥，那是无论怎么样高明的领导人都难以做到的，而且很难避免指挥者犯强迫命令和瞎指挥的错误。最终导致措施失当，因而达不到增产的目的。

农业生产的第二个基本特点是，它具有不可分割的连续性。它的每一项具体劳动，都同最终产品有直接关系，但又极难计算这些具体劳动在生产全过程中所占的份额，只有把生产过程中的各项有效的具体劳动结合到一块，表现在最终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上，才能计算出效益。农业的这一基本特点，要求人们在进行每一项具体劳动时，都要想到如何获得更多更好的最终产品。如果生产者在从事某些具体劳动时，不明确自己的职责和利益，象过去那样把各项具体劳动变成工分，按劳动日进行分配，人们在进行各项具体劳动时，就会只考虑自己能得到多少工分；而不考虑最终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这样要搞好生产是很难设想的。

现在的农业改革，就是吸取了三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从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出发，改革了“大呼隆”的劳动组织

和“按劳动日分配”的计酬形式，把家庭承包制同社会化、专业化结合起来。以家庭作为承包单位，就有效地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发挥了小规模经营的长处，克服了劳动“大呼隆”和分配平均主义的弊病，又继承了以往合作社的积极成果，坚持了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某些方面统一经营的职能，发挥了合作经济分工协作的优越性。因而，这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它同过去小私有的个体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同外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有着本质的不同。正如中央文件指出的，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农村生产关系变革以后，必然出现农村商品经济的大规模发展。这是今后农村经济发展的总趋势。现在的情况是，落实家庭承包制，解决了生产和分配的矛盾，但是流通领域中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一九八二年，金华地区许多地方都出现“卖粮难”、“卖油难”、“卖猪难”、“卖糖难”的情况，成了农村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因此，改革农村生产关系，解决了生产与分配的问题以后，如何解决流通问题，成了我们领导农业生产的新课题。因为商品经济的规律是，只有产品销售出去以后，它的价值才得以实现；产品没有销售出去之前，它只能是一种可能的价值。如果产品不畅销对路，或者流通渠道堵塞，产品卖不出去，那么生产就是无效的。搞好商品流通，供销合作社是一条主要渠道，现在必须进行改革，但是仅仅有一个供销社的渠道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同时，解放思想，大胆实践，逐步摸索出一条商品流通的新路子。一九八二年，金华地区在这方面开始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力发展各种专业户、

重点户和各种新的经济联合体，提倡大种大养，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积极倡导加强产、供、销服务，组织在提供信息，推广技术，搞好供销、加工、储存、运输等方面的社会化、专业化协作，支持发展各种专业购销户，正确引导农民从事社会需要的商业活动。这样做，不仅是农业发展的需要，而且是整个城乡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整个四化建设是很有利的。

农业生产的大规模发展，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关系变革以后，传统农业一定要向现代农业转变。这也是今后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过去我们重视得不够。由于“大呼隆”劳动和平均主义分配，农民缺乏学习文化知识、掌握科学技术的内在动力，我们推广一种新的科学技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结果成效甚微。农村生产关系变革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农民学文化学技术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科技热”。科学技术的春天真正到来了。因此，改革现有的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一方面尽量增加对农村的智力投资，提高农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一方面认真落实各项政策，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的作用，成了我们领导农业生产的又一个新课题。一九八二年，金华地区在这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尝试，诸如建立各级科技协会，创办科技小报，举办各种科技讲座，以及培训班、夜校、专业学校，运用多种形式，加强对农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同时，又落实科技人员政策，推广技术承包，鼓励他们放开手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等等。通过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既加快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步伐，也为我们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完善和发展农业的新路子，使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关键在领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我们虽然前进了一大步，但从整体上来说，还处在探索之中。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少同志在这场历史性变革面前缺乏思想准备，认识至今还转不过来，对这条新路子还有怀疑：有的感到“表现可以，成份可疑”，担心不符合社会主义；有的认为这是“权宜之计”，过几年还要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老路上去；还有的是因为大势所趋，中央有号召，群众自觉搞，挡也挡不住，心情颇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感。这种状况不改变，农民已经高涨起来的积极性就可能重新受到挫折，农村已经活跃起来的经济就可能受到窒息，刚刚开通的农民走向富裕之路就可能受到堵塞。因此，各级领导必须首先做好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通过系统训练，组织调查，总结工作，整党整风，帮助他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眼界，继续清除“左”的思想影响，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老框框，正确对待新生事物。我们编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正是想通过对农业改革的总结回顾，进一步加深对这场伟大历史性变革的理解，进一步提高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完善农业发展新路子的自觉性。同时，也想通过抛砖引玉，同一切有志于农村工作，有志于改革事业，有志于四化建设的专家、学者，从事理论和实际工作的同志，以及广大干部群众一起，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开创新局面。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各级领导，各部门的同志，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更大胆一点，工作更扎实一点，那么农业新路子就一定会越走越宽广，农民就一定会越来越富裕，农村就一定会越来越繁荣兴旺。

## 目 录

农业大变革的真实记录（代序言）	厉德馨
“五里”翻身记	1
大包干使大陈更上一层楼	9
粮食宝中宝 生财也有道	16
技术搞承包 包出金元宝	22
“田秀才”江金发传经	27
从此不愁育秧难	33
“绿色保险公司”	38
受欢迎的农机服务公司	43
放水到田 于民方便	49
张庭俊一家承包的农场	55
他打开了绿色金库的大门	60
周立荣父子包山	66
四户农民联合包山造林	72
蔡文彬荒山种乌柏	76
承包制改变了“败家场”的面貌	79
为了家家猪满圈	82
漫塘发展乡村手工业之路	87
“鸭司令”智闯圈养关	93

“冒富大叔”的笑声	99
一笔智力投资帐	104
能工巧匠三兄弟	107
渔晚之花	114
劳动、资金双联合的西陈糖果厂	120
新型的农业技术学校	124
培养农家技术员的学校	128
苗木，随他们的足迹运销四方	133
席乡“疏渠”人	139
运销机绣制品的农民队伍	144
出色的家庭运输队	148
一场“黄桃官司”的始末	151
扶持贫困户勤劳致富	155
开化大队的基本国策教育	159

## “五里”翻身记

常山县五里公社五里大队，在十年内乱期间，最多的一年开出过一千二百多张“讨饭证明”，出外讨饭的人占全大队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六。但这个大队落实了“双包”生产责任制后的一两年内，便摘掉了贫穷的帽子，实现大翻身！

### 吃尽“左”的苦头

五里大队依山傍水，土地肥沃，具有宜林宜粮、发展多种经营的优越自然条件。五十年代，这里山青水秀，林茂粮丰。当时的五里农业社曾被评为全县的农业生产先进单位，社长刘连法两次出席省劳动模范大会。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这里的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的损害。特别是到了十年内乱期间，生产力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一九六七年夏天，五里先遭水灾，继遭旱灾，当时“造反派”层层夺权，各级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天灾加人祸，迫得这里的许多社员重新拾起曾经用来进行阶级教育的讨饭棍，离乡背井，四出求生。社会主义社会里居然还有大批人外出讨饭，当时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批斗会开了一次又一次。然而风头一过，他们又操起讨饭棍出走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说来很简单，“左”的错误越严重，五里人民的肚子越加空，没办法啊！

那时干活“大呼隆”，几十个人一起劳动，吃了早饭还

不知道上午干什么农活。有一年春耕开始后，第四生产队社员你等我，我等你，七等八等，八、九点钟才派好工，派去撒石灰的一位社员，九时才赶到仓库，心急慌忙挑出一担上好面粉到田里，端起畚箕，三下五去二就把一担上好面粉当石灰撒掉了。社员在生产上没有说话份，干活就不会负责任。那时分配上平均主义，多劳不能多得，把人的积极性都搞光了。一年秋季，社员去收花生，连箩筐也不带。地里花生长得稀稀拉拉，收拣花生的男女老少却密密麻麻。大家肚子饿，边收边吃，“收吃并举”。俗话说，“山宽不如灶堂宽，田广那有嘴巴大”。大家都吃大锅饭，再厚的家庭也要吃空，何况五里已是穷地方。就这样，农民对土地的感情越来越淡薄，劳动积极性越来越低，田越种越瘦，产量越来越低，人均口粮只有三百多斤，有一年甚至只有二百零一斤。人均年收入只有三四十元，有一年每十个工分只值九分钱。

至于家庭副业和多种经营，更在批判之列。那时大队有个规定，凡是社员自留地上种的桔树，长到七尺高就得收归集体所有。大队特制一极竹竿，逢冬丈量，毫不手软。社员不甘心将壮龄桔树归公，偷偷地把根部挖空，让它慢慢枯死。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这个大队竟持续发生了十几年，年产柑桔从合作化初期的八十六万斤跌到两三万斤，最低的年份只有两千多斤。弄得桔子张口可接的桔乡人民，连饱眼福的桔子都几乎没有了。

社员从集体分配和家庭副业解决不了温饱，外出讨饭就避免不了。这个四百多户、一千六百多人的大队，最多一年就发出“讨饭证明”一千二百多张。五里人民吃“左”的苦头，真是吃到了头。

粉碎“四人帮”以后，五里大队人民的疾苦引起了省、地、县领导的关注。一九七八年县委派出工作组，带着国家拨给这个大队的一万元救济款、两万元生产资金、十五万斤救济粮来到这里。然而，“救急容易救贫难”，五里人民吃完了救济粮，花完了救济款，又返回了原路。一位老农沉痛地说：“不想办法挖掉穷根，光靠国家救济，有个完吗？”

一九七九年，五里公社的一位党委副书记，出于一个共产党员对人民事业的高度责任感，怀着对五里人民的无限同情，自告奋勇，来到这个大队兼任党支部书记。他每天比任何人都起得早，睡得晚，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人熬瘦了，眼熬红了。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左”的框框仍然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农业管理体制上“大呼隆”、“大锅饭”的弊病没有根本清除，他操碎了心也没有打开五里人民的心扉，五里的变化微之又微。

在事实面前，人们开始思索，开始醒悟：治穷必须挖根。五里人民前几年既因“左”而挨穷，那么，就得从纠“左”着手！

### 探索治贫之路

这里到一九八〇年夏，随着党中央关于农业改革的几个文件直接和广大农民见面，“左”的思想影响逐步得到清除，五里人民的心才开始复苏。那年双夏，第十一生产队有十多亩亩产可达六、七百斤的旱稻，过了立秋还没有收割，晚熟还有许多没有种下。社员们着急了。大家商量着，要将三十多户掰成四个操作组（分为小小队）。社员觉得这样化

大为小，化整为零，七、八户人在一块劳动比较自由，分配也比较方便。可是上面派到这里来的工作组，却怕“一枝动百枝摇”，影响其他生产队“所有制”的稳定，不同意。社员刘云海手拿刊登着“安徽凤阳大包干带来大变化”的《人民日报》与工作组评理。工作组才决定先在第九生产队搞划分操作组试点，待取得经验，再在全大队推开。认为即使失败了，损失也只是一个队，问题不大。其他十四个生产队的社员闻讯后也都自动搞了起来，那年冬季，全大队分成了四十五个操作组。

比起生产队来，分操作组劳动是方便了一些，效果也比较显著。一九八〇年冬种的进度和质量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快。可是，“大呼隆”变成“小呼隆”、“大锅饭”改成“二锅饭”，平均主义未根本克服，还是不符合广大社员的心愿。大家都在想，中央文件讲得明明白白，“三靠”地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责任制。我们五里大队一九六七年起年年吃国家的救济粮，一共吃了一百零二万七千多斤，国家给我们先后贷款五万五千元，是“标准”的“三靠”队。既然中央允许搞“双包”，大家愿意搞“双包”，我们五里大队就应该搞“双包”。在一段时间里，围绕着搞不搞“双包”责任制，四百六十一户农民，家里议，田头议，随时随地开展辩论，社员还找干部讲理，闹起包产到户的“风潮”来。

一九八一年二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大队会议室里召开共产党员和生产队长会议，但门口、窗口、走廊里都挤满了社员群众，干部会变成群众大会。这是一个决定着五里人向何处去，五里人能否富起来的“非常会议”。会议室里讨论十